

社会转型中 城镇妇女的工作和家庭

Urban Women's Work and Family
in Social Transition

左际平 蒋永萍 著



D669.68

29

社会转型中 城镇妇女的工作和家庭

Urban Women's Work and Family
in Social Transition

左际平 蒋永萍 著



当代中国出版社
Contemporary China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社会转型中城镇妇女的工作和家庭/左际平, 蒋永萍著. —北京:
当代中国出版社, 2009. 8

ISBN 978-7-80170-799-4

I. 社… II. ①左…②蒋… III. 城镇—妇女—问题—研究—中国
IV. D44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41651 号

出 版 人 周五一
责任编辑 王树清
责任校对 王小芸
装帧设计 古 手
出版发行 当代中国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地安门西大街旌勇里 8 号
网 址 <http://www.ddzg.net> 邮箱:ddzgcbs@sina.com
邮政编码 100009
编 辑 部 (010)66572152 66572264 66572154
市 场 部 (010)66572281 或 66572155/56/57/58/59 转
印 刷 北京润田金辉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80×1020 毫米 1/16
印 张 11.75 印张 2 插页 161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6.00 元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拨打(010)66572159 转出版部

前言

本书是根据我们 2006—2007 年进行的一项社会学田野调查撰写。该项调查的对象主要是城镇已婚女性，内容是关于她们在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改革中如何重新建构自己的家庭性别角色，换句话说就是，她们如何为自己的家庭角色重新定位，而她们的角色定位又是如何受改革中工作场所（即单位体制）变化的影响的。调查的基本目标是透过社会转型期中国城镇已婚妇女的工作和家庭的变化，分析国家、市场、家庭对家庭性别建构特别是城镇妇女性别建构的影响；最终目的是通过对性别建构的研究，探讨改革中国家与家庭关系的变化，寻求促进两性平等、家国和谐和推动妇女发展的制度保障和政策机制。

调查期间，我们在北京、上海、吉林、兰州以及河南省的某工业村深入采访了 137 位已婚妇女，并对其其中的一些人进行了跟踪观察和后续访谈。她们中年龄最大的 59 岁，最小的 24 岁，平均年龄为 41 岁。这些妇女来自各行各业、各个阶层、各种家庭，生于不同的年代，有着不同的人生经历和生活背景。访谈中，她们谈到了改革触动工作和家庭生活的情况，对工作和家庭关系的处理方式，家庭劳动分工以及她们对性别角色的认同等等。那些在计划经济时期工作过的妇女，还对比了改革前后在工作、生活的方方面面所发生的变化和她们的想法。她们的坦诚态度、直白的描述和生动的话语，为我们展示了百姓生活随时代变迁而发生的色彩斑斓的画卷，使我们情不自禁地与她们一起感受人生的甜酸苦辣和家庭的喜怒哀乐。她们流露的真挚情感和话语中蕴涵的生活哲理，不仅给我们以理论和政策上的启迪，而且为广大读者提供了时代的记录、人生的借鉴。

本书主要考察计划经济时期和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转型时期城镇妇女的工作与家庭生活，但以转型期为主。我们在写作时，力图做到学术与大众兼顾，既有丰富多彩的第一手生活记录的记述与整理，又有严肃的理论分析与学术讨论。

第一章是导论。它提出了研究的问题，点出了本书的主题，介绍了我们的研究视角和理论取向，并详细描述了我们的具体研究方法，其中包括取样、资料的搜集过程，访谈方式和分析方法。

第二章追溯了“家国同构”理念和实践的历史渊源，阐述了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与家庭相互同构的过程、特征、途径以及对城镇妇女建构性别角色的影响。通过对史料的分析，我们指出，计划经济时期在“家国关系同构取向”的主导下，城镇已婚妇女按照“国家人”和“男人以社会为主，女人以家庭为主”的家庭“性别人”的双重身份来建构其性别角色。由于家国关系同构在建设中较好地保证了国家和家庭利益的一致性，妇女的这种双重身份也具有较为和谐的性质，即为国就是为自己的小家，家庭内部的性别分工也是国家建设中男女合作的一种策略。在这一时期，虽然妇女的付薪劳动和家务劳动都比较繁重，但她们的角色冲突和角色紧张均不明显。

第三章介绍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改革的背景和城镇经济体制改革的内容。详细叙述了在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改革过程中，在管理构架上国家和家庭是如何分离以及市场是如何介入的。它主要包括市场机制的全面引入，单位制的解体和福利保障的减少，多种所有制并存和劳动关系的变化，从按劳分配到按多种要素分配，公共服务的市场化、产业化改革以及体现在性别政策内的“家国分离”倾向等几个方面。

第四章以“新中国一代”和“改革一代”已婚妇女的亲身经历展现市场转型中妇女性别角色的重塑过程。在这一章可以看到，随着公私领域/家庭和国家的分离，职业妇女“国家人”的意识逐渐淡化，主要表现在国家主人翁心态和单位归属感的减弱，被剥夺感的出现以及“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人”意识的相对加强。我们注意到，改革后出现的“性别人”和改革前有所不同。前者体现了家庭内部夫妻分工、家庭外部男女合作的基调以及家庭和国家比较一致的关系，而后者则是在市场化进程中伴随“家国分离”、“公私划界”而唱响的，它表现出家庭内部夫妻分工合作与家庭外部男女竞争的矛盾。与此同时，“市场人”开始在妇女的意识中悄然萌生。市场人的人格特征包括以己为中心，以获取物质利益为基本出发点，以竞争为手段，以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为最终目的。它与家庭的照料功能相左，从而在为个人追求个人物

质利益提供动力的同时也加剧妇女在工作、家庭上的矛盾。

第五章介绍城镇已婚妇女在市场转型中家庭性别建构多元化的格局。我们把访谈对象按照对工作和家庭劳动处理方式的不同分为三类：回归家庭型、兼顾工作和家庭型、向工作/事业倾斜型。本章着重分析这三类女性如何选择和扮演不同的家庭性别角色，她们的选择如何在工作环境或工作场所的变化中形成，她们的家庭性别角色的选择又是如何受家庭环境制约的。本章还记录了不同女性对夫妻平等概念的理解以及她们各自的处境如何影响她们的平等观以及她们与丈夫的关系。

结尾的第六章，着重探讨这项研究的理论和政策意义。我们认为研究妇女家庭角色的建构一定要跳出文化和夫妻关系的层面。一味强调传统文化的刚性会陷入文化本质主义；同样，把夫妻分工不平等简单归结为男性特权的持续或夫妻博弈的结果会忽略造成传统分工刚性的“家国分离”以及市场介入等宏观层面的因素。在宏观层面上，我们讨论了“公平与效率”的理论问题。根据中西方的经验，我们挑战所谓生产先于分配，小政府、大市场的“效率说”，特别强调国家在保障民生、缓解妇女工作与家庭矛盾诸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与此同时，本书还介绍了国际社会和他国采取的相关政策和法规。在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借鉴他国经验，提出了中国妇女发展以及解决工作、家庭矛盾方面的政策建议。

本项目先后得到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SES - Sociology 0518083,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和美国社会学协会提供的学科发展基金（Fund for the Advancement of the Discipline, 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资助。在田野调查中，我们得到了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上海市妇联、吉林市妇联、甘肃省妇联、河南省妇儿工委以及各级妇联有关干部和工作人员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在此，表示诚挚的谢意。我们还要感谢兰州大学社会系所给予的积极协助。张名先生对本书提供了不少宝贵意见并参加了校对工作，也一并致谢。最后，我们向所有访谈对象表达感激之情。没有她（他）们的支持与合作，我们是无法完成这个项目的。

目 录

前 言 / 1

第一章 问题的提出与研究的意义 / 1

- 一、转型过程中市场对城镇已婚妇女工作和家庭的挑战 / 1
- 二、研究视角与理论框架 / 5
- 三、对关键词的基本定义 / 16
- 四、具体研究方法 / 18

第二章 计划经济时期的“家国同构”与妇女性别角色的双重建构 / 21

- 一、“家国同构”的理论渊源及对新中国政府治理的影响 / 22
- 二、“家国同构”下的性别政策的特点及其对妇女的影响 / 29
- 三、“家国同构”下的性别建构特征、途径与模式 / 45

第三章 经济体制改革和“家国分离”的政策倾向 / 55

- 一、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政策变化 / 56
- 二、体现在性别政策内的“家国分离”倾向 / 71

第四章 “家国分离”倾向与妇女性别的双重建构 / 75

- 一、“国家人”的淡出和“市场人”的出现 / 75
- 二、“男人以社会为主，女人以家庭为主”——家庭性别人的强化 / 103

第五章 多重影响下妇女的家庭性别角色建构 / 110

- 一、回归家庭型 / 110
- 二、工作家庭兼顾型 / 121

三、向工作/事业倾斜型 / 138

第六章 理论思考和政策讨论 / 155

一、基本结论和理论思考 / 155

二、政策反思和对策建议 / 166

后 记 / 175

CONTENTS

CHAPTER 1 RESEARCH QUESTIONS AND SIGNIFICANCE OF THE STUDY / 1

1. Challenges from the Market to Women's Work and Family / 1
2. Perspectives and Analytical Framework / 5
3. Definitions of Key Concepts / 16
4. Methodology / 18

CHAPTER 2 "FAMILY-STATE CO-BUILDING" AND WOMEN'S GENDER CONSTRUCTION IN PLANNED ECONOMY / 21

1. Theoretical Origin of "Family-State Co-building" and Its Impact on the Government of New China / 22
2. Characteristics of Gender Policies and Their Impact on Women under "Family-State Co-building" / 29
3. Characteristics and Mechanisms of Gender Construction under "Family-State Co-building" / 45

CHAPTER 3 ECONOMIC REFORM AND THE TREND OF "FAMILY-STATE SEPARATION" / 55

1. Market-Oriented Changes of Economic Policies / 56
2. "Family-State Separation" Reflected in Gender Policies / 71

CHAPTER 4 THE TREND OF "FAMILY-STATE SEPARATION" AND
WOMEN'S DIVERSE CONSTRUCTION OF GENDER / 75

1. Fading of the "State Persons" and Appearance of the "Market Persons" / 75
2. "Men be Society-Oriented and Women, Family Oriented" —
Strengthened Gender Personhood / 103

CHAPTER 5 WOMEN'S FAMILY ROLE CONSTRUCTION UNDER MULTIPLE
INFLUENCES / 110

1. Those Who Return to the Home / 110
2. Those Who Combine Work and Family / 121
3. Work/Career Oriented Women / 138

CHAPTER 6 THEORETICAL CONSIDERATION AND POLICY
DISCUSSION / 155

1. Basic Conclusion and Theoretical Consideration / 155
2. Policy Retrospection and Suggestions / 166

EPILOGUE / 175

第一章

问题的提出与研究的意义

一、转型过程中市场对城镇已婚妇女工作和家庭的挑战

中国 30 年来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改革不仅深刻地改变了计划经济时期的社会体制和观念形态，而且对人们的工作和家庭也产生了巨大影响。随着全党工作的重点从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设，工作岗位日益成为人们发挥经济、技术才能，实现人生抱负的场所。从总体来看，随着经济和科技的迅速发展，城乡家庭和个人的物质生活水平都有了大幅度提高，家庭中的体力劳动强度大大减轻，家庭生活质量的意识也日益提高。更重要的是，家庭逐渐从国家的安排和庇护下脱离出来，成为既独立又依赖于国家的、有自主能力的主体。家庭主体的形成为中国妇女及其家庭带来了更多的发展机遇和更广阔的生存空间。当然，这种格局的形成也给广大妇女在处理工作和家庭关系方面提出了新的挑战。其中一个突出的现象，就是城镇妇女对工作和家庭角色的重新塑造。众所周知，在改革以前，95% 以上的城镇妇女都参加工作，并引为自豪。在工作和家庭之间，那时的妇女往往把工作放在第一位或至少让工作与家庭平起平坐。改革以后，这一现象发生了很大变化。部分妇女的天平逐渐向家庭倾斜：先是在已婚妇女中出现了“全职太太”，然后在女大学生中又开始流行“干得好不如嫁得好”的说法。各项研究也表明，改革以来，“男主外、女主内”的传

统角色观念得到强化。^①从第一期和第二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的比较看^②，在1990—2000年的十年中，一方面城镇女性受教育的程度与男性差距继续迅速缩小，另一方面却出现了妇女更多地向家庭角色倾斜的现象。与1990年相比，她们更加赞同“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从1990年的32.7%上升到2000年的35.7%）；她们与男性在日常家务投入时间上的差别也在相应扩大（从2.05倍增长到2.59倍）；有的妇女甚至退职回家料理家务。据统计，2000年，25—29岁不在业的女性中，退职料理家务者占40.3%。

这种城镇妇女“回归传统”的趋势对马克思主义和女权主义有关妇女解放的理论提出了挑战。前者认为，妇女只有通过参加社会大生产才能最后获得解放，而后者则将家务分工的平等作为衡量妇女解放的重要尺度。那么，如何来诠释这种看似矛盾的现象呢？为什么大多数城镇妇女没有充分利用她们与男性几乎同等的教育资源与丈夫争取平等的性别分工呢？当然，最容易的解释就是由于传统观念的刚性。然而，这种说法无法解释传统性别角色为什么在一个实践了半个多世纪男女平等的国度里重新得到强化。如果给目前家庭性别分工趋势简单贴上“传统”和“文化”的标签，既不利于深入挖掘各个时期性别分工的不同内涵和逻辑，也有碍我们积极寻找文化以外的其他成因。这不是说不要从文化的角度来考察这一现象，而是要将文化和经济、历史、社会等因素放在一起综合考查。文化根植于社会物质生产和人们的物质生活环境。文化不仅有历史传承的作用，还具有强烈的实用性和工具性。它既可以为个人行为的合法性提供传统的依据，又可以被集体用来抵御外来的不利影响。比如，不愿为事业奔波的妇女喜欢把“贤妻良母”挂在嘴边，职场失意的男子最看重他们“一家之主”的地位。同样，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文化一体化的趋势不仅

① 冯立天、巴巴拉·安德森、王树新、张坚：《北京婚姻、家庭与妇女地位研究》，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5年版。张卫平：《性别意识与女大学生成才障碍透视》，见《半个世纪的妇女发展》，当代中国出版社2001年版，第256—262页。石红梅、叶文振、刘建华：《女性性别意识及其影响因素》，见《世纪之交的中国妇女社会地位》，当代中国出版社2003年版，第431—445页。

② 陶春芳、蒋永萍：《中国妇女社会地位概观》，中国妇女出版社，1993年。蒋永萍：《社会转型中的中国妇女地位》，中国妇女出版社2006年版。

没有出现,反而被要求多元文化、甚至强化传统文化(包括传统宗教)的呼声给淹没,其原因与全球化导致的利益大分化和利益集团的形成密不可分。利益受损的群体往往更倾向于借助传统文化来维护日益失去的权益。另外,还可以把文化现象作为一种发展过程来研究。费孝通先生曾说过:“文化发展并非都是单线式的……其中很妙的现象在于,一时认为没有用的文化,沉默一个时候又会出现,发扬起来,还很解决问题。”我们的任务之一即是研究传统性别文化现象的盛衰过程以及推动其变化的物质动力。

从历史的维度分析,有不少学者认为,新中国成立后对城镇传统家庭性别分工的冲击主要是由于自上而下的行政手段的操作。^①具体来讲,就是通过国家行政手段安排城镇妇女全面就业来实现的。这种人为安排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它虽然帮助妇女走出家门,摆脱封建主义的压迫,但也同时加剧了她们的双重角色冲突。甚至,国家在就业方面的某些解放妇女的政策措施是以抑制男性在职场上的能力发挥为代价的。因此,改革中出现的“传统回归”也许可以理解为对改革前国家对城镇妇女“过度解放”的一种反弹。然而,也有学者发现,与改革之前相比,改革后城镇妇女的角色冲突相对强烈很多。^②相比之下,改革前的城镇妇女,尤其是五六十年代的妇女并无强烈的角色冲突的感觉。因此目前城镇妇女向家庭角色倾斜的现象还不能简单地解释为对改革前妇女“过度解放”的反弹。这就要求我们不仅要重新反思计划经济时期政府一系列政策和行政手段对城镇家庭性别角色建构的影响,更要将其与改革后国家政策的变化和市场化进程联系起来看。

目前,国内外有关中国市场转型前后的家庭性别角色建构的研究大体分为两种。一种是从家庭的角度看夫妻各自的传统观念以及社会上传

① 蒋永萍:《社会转型中的中国妇女地位》,中国妇女出版社2006年版。郑也夫:《男女平等的社会学思考》,载《社会学研究》1994年第2期。郑也夫:《权利·自由·出路》,载《社会学研究》1995年第3期。

② 刘伯红、张永英、李亚妮2008年的研究报告:《协调工作和家庭的矛盾:中国的问题和政策》,2008年,未发表。Rofel, Lisa. 1999. *Other Modernities: Gendered Yearnings in China after Socialis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左际平:《改革中城市“家庭抚养”的性别建构》,载《清华社会学评论》,2000年第2期。左际平:《20世纪50年代的妇女解放和男女义务平等:中国城市夫妻的经历与感受》,载《社会》2005年第1期。

统文化的刚性如何影响夫妻各自性别角色的形成。^① 还有一种是从劳动力市场的角度看市场对妇女就业的歧视及其对妇女性别角色建构的间接影响。^② 这两种分析的缺憾在于, 它们均未涉及国家和市场在妇女性别建构中的交织作用, 而这种交织作用往往通过妇女双重角色的冲突与否显现出来。夫妻双方头脑中的传统观念、妇女家庭劳动的承担以及就业中的性别不平等, 这些现象在改革之前也存在。为什么在那个时期妇女对单位的认同感(比如“以厂为家”)要大于对家庭的认同感呢?^③

近年来, 虽然有关妇女双重角色冲突的论著犹如雨后春笋, 但将其与妇女性别角色建构相联系的却寥寥无几, 且大部分研究报告都是从管理学或心理学视角出发, 缺乏对妇女角色冲突的宏观把握。西方经济发达国家虽不乏论述妇女双重角色冲突和国家市场的关系的著作, 但其社会、历史情境却与中国大不相同。西方妇女的双重角色冲突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典型的资本主义条件下, 社会生产和再生产是在经济、家庭两个功能截然不同的领域里运转。私有经济对利润的追逐从一开始就与家庭的养育、照料功能相冲突, 因而形成家庭性别分工。^④ 在资本主义早期阶段, 大部分妇女并不就业。妇女大规模就业是20世纪下半叶的事情。因此, 西方研究大多集中在已婚妇女就业后, 由于工作场所相应调整滞后所造成的角色冲突以及夫妻性别角色紊乱和困惑等诸问题。^⑤ 在实证研究中, 西方的研究题目多局限于诸如上班时

① 左际平:《改革中城市“家庭抚养”的性别建构》, 载《清华社会学评论》, 2000年第2期。Zuo, Jiping and Bian, Yanjie. 2001. “Gendered resources, division of housework, and perceived fairness—A case in urban China.”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63, 1122—1133.

② Parish, William L. and Busse, Susan. 2000. “Gender and work”, in Wenfang Tang and William L. Parish (eds.). *Chinese Urban Life under Refor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9—31. 王金玲、赵杰:《女性社会学的本土研究与经验》,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③ Harrel, Steven. 2000. “The changing meanings of work in China”, in Barbara Entwisle and Gail E. Henderson (eds.). *Re - Drawing Boundaries: Work, Households, and Gender in China*,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67—78. Lee, Ching Kwan. 2000. “The ‘revenge of history’: Collective memories and labor protests in northeastern China.” *Ethnography*, 1, 217—237. 石彤:《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社会排斥——以国企下岗失业女工为视角》,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佟新:《异化与抗争》,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④ Brenner, Johanna. 2000. *Women and the Politics of Class*,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⑤ Hochschild, Arlie. 1989. *The Second Shift*. New York: Viking Penguin Inc.

间死板、工时安排僵化、托幼难等具体问题对夫妻处理工作与家庭关系的影响,其理论也往往停留在工作场所和家庭等中微观层面上,^①鲜有像马克思等社会批判家那样将工作、家庭冲突上升到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剖析。因此,政策建议也往往局限于灵活安排工时、建立家庭友好型或支持型的工作场所(比如灵活工作时间、价廉的托儿服务)等具体措施。^②而中国的城镇妇女,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前就业的妇女,在社会主义制度内一直享受着种种国家支持妇女就业的宏观政策。事实上,改革后妇女双重角色冲突的凸显与经济转轨有着直接的关系。所以,我们的研究所面临的问题不是工作场所调整的滞后,而是在市场化进程中工作场所发生了哪些变化,这些变化绝不仅仅局限于上班时间的设置、工时安排(甚至工时的长短)、托幼难易等具体问题,它们还涉及到工作的意义、就业保障、劳资关系和产品再分配的原则等一系列重大问题;而这些变化又是怎样导致了妇女的双重角色冲突,从而促使她们重新建构家庭性别角色。此外,在大部分西方社会里,市场是社会运行的主要机制,国家对经济、社会和家庭只通过法律和政策实行间接干预。而在中国,国家的作用历来不同。她一向通过行政干预直接渗透到社会和家庭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要想更透彻地了解改革中职业妇女如何在双重角色冲突中重构家庭性别角色,须将国家和市场均纳入分析框架,从历史和制度的变迁中去寻找答案。我们的研究正是以市场转型中城镇已婚妇女的工作和家庭角色的变化为切入点,通过分析妇女的性别建构,透视市场对家庭的影响。

二、研究视角与理论框架

1. 研究视角

我们的研究有三个基本视角。

① Pleck, Joseph H. 1995. *Working wives, working husbands*, Beverly Hills, CA: Sage. Voydanoff, Patricia. 2005. "Toward a Conceptualization of Perceived Work - Family Fit and Balance: A demands and Resources Approach."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67, 822—836.

② Gerson, Kathleen and Jacobs, Jerry A. 2007. "The Work - Home Crunch." *Contexts*, 3 (4), 29—37.

其一是历史情境和动态的视角，即以改革前城镇妇女的家庭性别角色的建构为出发点，梳理改革中妇女重建性别角色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是在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大背景下起始的，因此它的进程带有强烈的计划经济时期的印记和对这段历史的回溯。厘清改革前城镇妇女的家庭性别建构是本书的首要任务。在此基础之上，我们着眼于改革后妇女性别角色的变化以及这些变化和市场的联系。

其二是交织的视角，即我们关注国家、市场与家庭的互动与交织关系，尤其是引进市场机制前后国家和家庭在妇女性别角色选择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学习苏联，实行计划经济，在无市场的条件下遵循的是“家国同构”的战略方针，即以治家的方式治理国家，在治国中整合家庭，实现家国一体化。国家一方面要求家庭建设与国家建设目标相一致，另一方面也为家庭提供各种基本生活保障，力求兼顾二者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妇女（以及男人）的家庭角色是紧密围绕国家与家庭的关系来确定的，因而夫妻双方既具有“男人以社会为主、女人以家庭为主”的“性别人”特点，又具备夫妻双方共同为国效力的“国家人”特征。由于家国高度一体化，性别人和国家人既有区别，又同处一个相对和谐的统一体中，妇女虽担负繁重的工作和家务劳动，但工作与家庭角色的冲突并不明显。其代价是家庭的自由空间较小。到了经济改革时期，国家的工作重点转向经济建设，并通过一系列市场导向的经济政策推动经济发展。市场的介入缩小了国家对家庭的整合作用和提供福利的范围。但从另一方面讲，它加强了家庭的扶养和照料职能并为此提供了一定的自由空间。然而，市场的介入也同时加剧了家庭经济生活的不确定性，并凸显家庭经济扶养的紧迫需要。对职业妇女而言，这意味着工作与家庭双重角色冲突的可能性。于是，强化家庭内部的性别分工成为许多夫妇实现家庭利益最大化的手段，或缓和性别角色冲突的权宜之计，而非简单的传统回归或对计划经济时期所谓妇女角色冲突的反弹。

其三是从微观看宏观的视角。具体说就是，我们从城镇妇女日常工作和家庭生活的细节中去观察分析她们性别重构的过程，这一过程与工作场所变化之间的联系，以及透过这一联系看中国市场改革中市场、国家、家庭三者互动对妇女家庭性别角色重构的影响。我们在分析中力图始终把握宏观政策和制度在不同时期的变化，将城镇妇女的日常工作和

家庭生活放在宏观变化的情境中去考察。但在考察的过程中,我们特别强调妇女的主体性和她们的主观能动意识,即力求以她们的视角来观察世界,用她们的生活体验来分析判断变化的实质,从她们与家人和单位的互动过程中发现宏观与微观的联系。

2. 理论框架

由于我们的研究重点放在市场的介入对妇女处理工作和家庭性别角色的影响,因此,用于指导我们研究的理论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社会学有关市场与妇女和家庭性别分工的理论,用于我们对市场和家庭性别分工进行结构分析。第二部分是性别建构理论,用来帮助我们了解妇女在改革前后塑造她们工作和家庭性别角色的主观动因。

(1) 市场和家庭分工理论

马克思和恩格斯最早对资本主义市场社会中妇女家庭地位的变化做出了精辟的论述。在很多著作中,他们都阐明,资本主义私有制在压迫、剥削工人阶级的同时也降低了妇女的家庭地位。^①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恩格斯特别指出资本主义的私有经济不仅在生产关系上形成一部分人剥削、压迫另一部分人,而且导致集体户(communal household)的解体,在一夫一妻制的新型私人家庭(individual family)里实行“男主外、女主内”的劳动分工。而分工结果造成丈夫的经济地位高于妻子,从而形成夫妻之间的剥削与被剥削、压迫与被压迫的阶级关系。在恩格斯的眼里,家庭内部性别关系的运作是与市场阶级关系的运作相平行的,都是由经济地位所决定。而经济地位的差异又是由私有制造成的。因此,妇女要想从性别压迫中解放出来,就要冲出家庭,参加社会化大生产;另外,还要消灭私有制家庭,将家庭的哺育和照料功能社会化,从而消除压迫妇女的土壤。

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关系的学说对20世纪西方白人中产阶级女权主义的影响很大。很多西方社会主义女权学者纷纷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妇女低廉的劳动工资和无偿的家务劳动如

^① 见 Marx, Karl. 1947. *German Ideology*.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Marx, Karl. 1964. *The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 Manuscripts of 1844*.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Engels, Frederick. 1972. *The Origin of the Family, Private Property and the State*.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